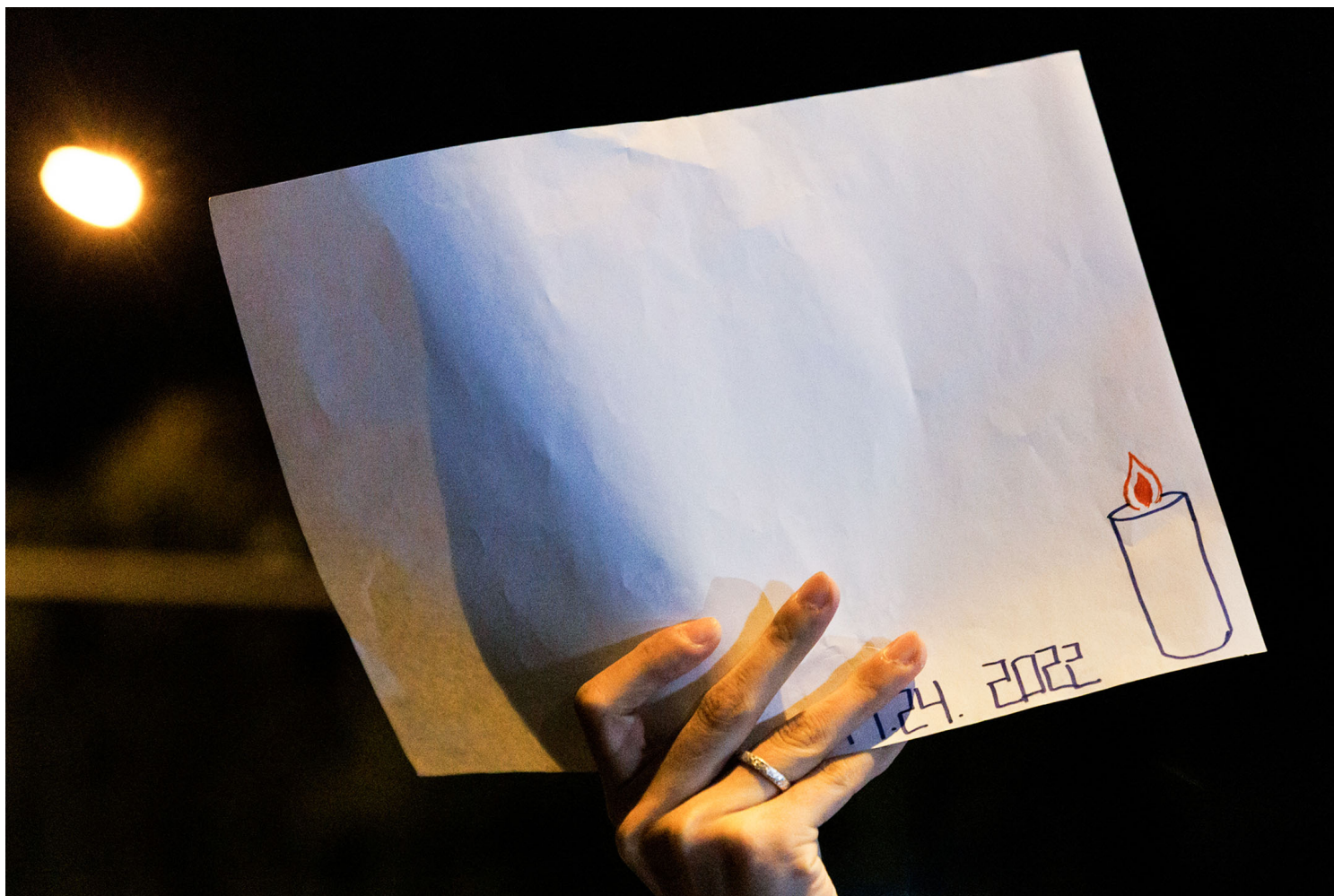


大陆 深度

白纸运动被捕者：她们是谁，经历了什么？

如此年轻，又如此热情，假以时日，她们能承担起更多。只是，如今面临严厉的打压，“起点却仿佛成了终点”。



2022年11月27日，北京，一名妇女拿著一张写有乌鲁木齐火灾日期的白纸，以悼念死难者。摄：Thomas Peter/Reuters/达志影像

特约撰稿人 Sharon | 2023-02-03

白纸抗议 中国人权 中国社会运动 社会运动 中国政治

本文由端传媒与NGOCN声音计划联合发布，首发于端传媒。

2023年1月20日上午，农历春节来临的前一天。在失去自由29天后，27岁的曹芷馨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律师。

这是在北京朝阳区看守所的会见室。她穿着土黄色的棉布上衣，灰色的棉裤，这是看守所的“号服”。按照惯例，会见时间只有40分钟。

“她很坚强。”知情者说。

前一天夜里，也就是北京时间的1月19日晚上11点多，被关押在朝阳区看守所的多名“亮马河悼念活动”的参与者，被陆续以“取保候审”的名义释放，其中有记者杨柳、秦梓奕等人，但曹芷馨没有在其中。她和她的另外几位同龄密友，包括李元婧、翟登蕊、李思琪，同时被宣布批准逮捕。罪名也由此前的“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”更改为“寻衅滋事”。

据知情者称当晚被批准逮捕的至少有20多人，他们都与2022年11月27日夜发生在北京亮马桥、反对疫情封控的悼念与抗议活动有关。

知情者说，曹芷馨在得知自己被批捕的消息后，感到非常失望。她确实从来没有想过，自己参加一个正常的悼念活动，会遭遇如此严重的后果。在收到家人以及男友的问候与关心时，她忍不住流下了眼泪。

而在此次见到律师之前，她并不知道自己在被抓之前录制的求助视频，已传遍了全世界。在这个视频中，她预感到自己将要“被消失”，而尖锐地发问：“我们这些青年只是正常地悼念自己的同胞，为什么要付出被消失的代价？我们是谁不得不交差的任务？”

早在1月9日，律师就为她提交了取保候审的申请，但被驳回。1月17日，律师向检察院提交了“不批准逮捕意见书”，认为她只是“参与了自发的民众悼念活动，完全不构成犯罪。”但这份意见书并没有被检察院采纳。

和曹芷馨同一天被批捕的另一位年轻女性——27岁的翟登蕊，则没有在农历春节前见到自己的律师：繁琐的各种申请手续，以及不断出现的“意外”，让会见变得很困难。

在失去自由之前，翟登蕊正准备申请到挪威的奥斯陆大学攻读戏剧专业的研究生。热爱文学与戏剧的她已经为此准备了很久。原本她的亲人想在律师会见时间问到她的申请密码，替她提交申请，但因为律师迟迟不能会见，如今已错过申请日期，只能留下遗憾。

还有李元婧，毕业于南开大学，又从澳洲留学回来，是一位职业会计师，也是她们中“最有钱的”。以及李

思琪，一位热爱写作与读书、自称“不自由撰稿人”的青年。她曾经毕业的伦敦大学金斯密斯学院，于2023年1月28日刚刚为她发出了支持声明。

她们四个人，是同龄的密友，在失去自由之前，都居住在北京鼓楼老城区的胡同一带。她们都有鲜明的文艺青年气质：喜爱阅读、写作、电影放映，以及地下音乐。她们热衷于探索这座城市里那些处于夹缝中的、有叛逆气质的公共空间。

她们关心社会议题，但还没有来得及进行真正的公共发言。在一位密友的眼里，曹芷馨，以及她的朋友们，大多数只是“半积极分子”，是一群热爱生活的、“对什么都有兴趣”，愿意什么都去尝试的年轻人。“但她们与真正尖锐的问题之间，还有一定距离。”

她们基本上都是在2015年左右进入大学。从那时到现在，原本就十分薄弱的中国公民社会一直处于被高度打压的状态。近十年来，在北京，很多公共领域的讨论与行动已难觅踪迹，而她们，身处文艺资源曾十分丰富的北京，在残存的公共领域的夹缝中生长起来，并有一条脉络可循。她们身上，有着这一代人的独特烙印。

“她们是一群有反思能力的人。她们也是行动主义者。”曹芷馨和翟登蕊的另一位朋友阿田（为保护当事人，此处用化名）说。他于2022年9月离开北京，去攻读博士学位。他说自己如果在北京，那天晚上，也一定会和她们在一起。

“这一切迟早都会发生的，这三年极端压抑的疫情管控只是一方面。”他说，在这片土地上，“只要有不公不义在，反抗就一定会发生”。

“假以时日，她们可以承担起很多东西。但现在，随着她们仅仅因为一次街头抗议就面临严厉的刑罚，起点却仿佛成了终点。”阿田说。显然，作为朋友，他为此感到痛楚。





2022年11月27日，曾聚集大量悼念市民的上海烏魯木齊中路，路牌被拆掉放在地上。網上圖片

1 被捕 2022年12月18日，卡塔尔世界杯决赛的当天，曹芷馨从北京到了上海。

二十多天前的11月27日夜，她和一些朋友在网上看到了悼念乌鲁木齐火灾死难者的消息，就去了离家不远的亮马桥。“对她来说，那是很自然的事情。”她的男友后来说。

她带了一束鲜花，摘抄了一些诗句。有人看到了她在微信上发的两条朋友圈，那是她在现场。照片上也只是鲜花，诗句，还有站在一起的年轻人们。

已是深夜，离开现场后，她和朋友们又去了鼓楼周边的酒吧玩，然后于凌晨时回家。好友翟登蕊也借宿到她那里。她一觉睡到大天亮，而此时，远在国外读书的男友，正在焦急地联系她。

11月29日中午11点多，曹芷馨正在和男友通电话。男友在电话那头听到了曹的房间有警察上门，一片杂乱的声音。

“她是个心很大的女生。门都没锁。”她的另一位朋友后来说。五、六名警察直接进了她位于胡同杂院里的小屋。

她被带去了附近的交道口派出所。根据中国法律的规定，传唤或拘传不得超过24小时。和当日被带走的大多数人一样，次日凌晨，曹芷馨被放回了家，但手机和电脑以及iPad被扣在了派出所。

回到家的曹芷馨有一丝担心，但依然正常生活着。12月7日，在亮马桥悼念活动发生10天之后，中国政府公布防疫措施“新十条”，全面放开了疫情管控。身边几乎所有的人都感染了一轮，曹芷馨也不能幸免。

政府在一夜之间放开管控，在全中国，买不到基本药物的人们都在自救。但无路如何，荒谬而严酷的清零政策终于结束了。“人们终于获得了在家生病的权利。”作家狄马曾这样评论。

也是在这样的氛围中，曹芷馨和她的朋友们多了一丝乐观。无论如何，政府放开管控，其实是间接承认了封控清零政策的失败，这似乎使得此前的悼念和抗议活动无可指责。

在第二次被警察带走之前，曹芷馨曾和密友一起讨论可能的后果。

“我们当时猜测：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，这个事情会不了了之，毕竟大家只是正常地去表达了一下哀悼之情。但也有百分之四十的可能，去了现场的人会面临几天的行政拘留。只有百分之十的可能，会有严重的后果。”她的朋友说。

但最终，出乎意料的，那个最坏的结果降临了。

12月18日的卡塔尔世界杯决赛，直播是在中国的半夜。曹芷馨专门买了炸鸡，和男朋友约好一起看世界杯。球赛大约看到一半，她突然告诉男友，她全身都凉了。因为她得到了消息：曾去亮马桥现场的好几个朋友又被抓了，包括杨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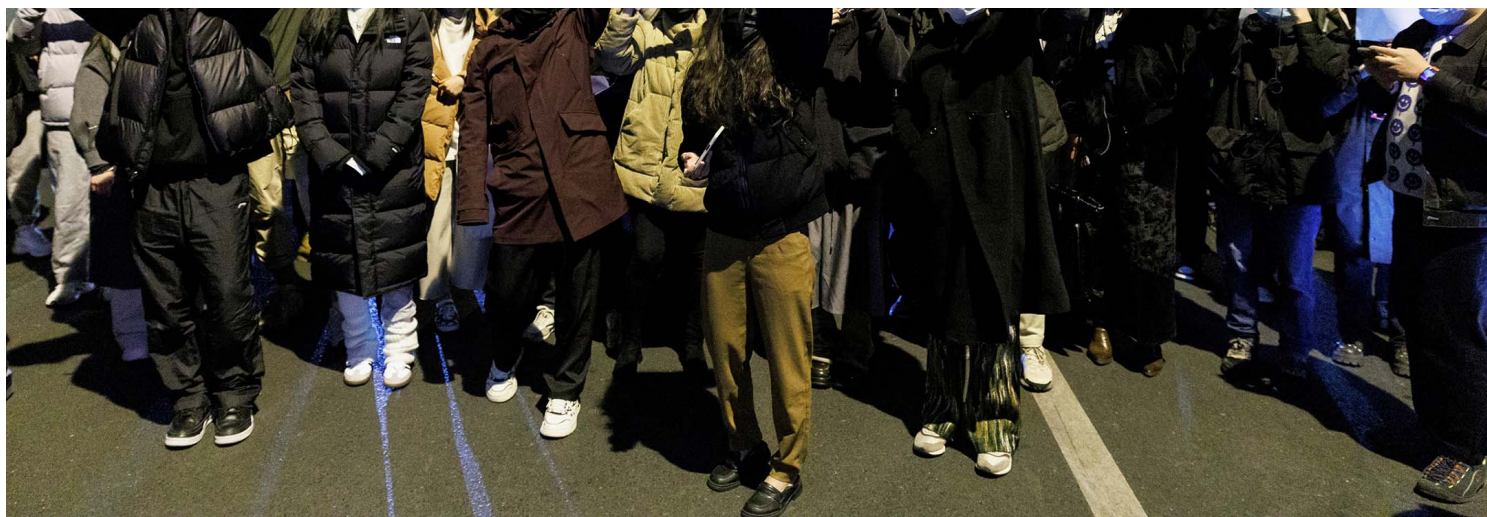
“那个夜晚，一方面是世界杯上的欢呼，梅西获胜的喜悦，一面我们的心又冷如冰窖。”她的男朋友说。那是个奇特的夜晚，愤怒、担忧交织在心头，让他至今难忘。

第二天，曹芷馨就坐火车回到了湖南衡阳的老家。“她觉得，哪怕被抓了，也是和家里的人在一起。”朋友说。

在老家的五天里，家人不知道，曹芷馨悄悄录下了一段视频。如果她被抓，这段视频将会被朋友们放出来。视频上，她穿蓝色的衣服，中长的头发。她有着明亮的眼睛，是一个美丽的女孩。

12月23日，接近中午时分。来自北京的五六个警察敲开了湖南衡阳的家门，带走了曹芷馨。





2022年11月27日，北京，烏魯木齊火災遇難者紀念活動期間，人們聚集在一起守夜並舉著白紙抗議。攝：Thomas Peter/Reuters/達志影像

2 胡同里的“鼓楼文艺青年”

被警察带回北京的曹芷馨，先是被关押在平谷区看守所，又于2023年1月4日转移到了朝阳看守所。

很快，房东的电话就打到了老家，告知要终止租房合同，让曹芷馨搬家。寒冷的北京一月，家人只得委托了她的朋友，一点点把她的书和生活用品搬出了她租住的东旺胡同一号。

从湖南出来上学“北漂”在京，曹芷馨对胡同有一种热爱的执念。离开学校后，她就一直租住在鼓楼附近的胡同里。被抓之前，她租住在胡同里的一间一居室，在一个带大门的小杂院里头。

朋友说，她此前租住胡同的第一个房子更小，是一个铁皮搭的阁楼，“站在房子里，有一块地方都伸不直腰。”

2021年7月，曹芷馨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。上学时，她的专业是贸易史，研究生毕业的论文题目就是“明清时期的长沙”。她对城市的历史很着迷，看过那本《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》。她也很喜欢研究城市的肌理和市井生活。

“我是北京人，可我并不喜欢胡同。胡同里环境杂乱，没有厕所，一般人受不了。”她的朋友说。“我没有她那么热爱北京，但她和这次被抓的朋友，却最喜欢北京这种多元文化、民间生态，以及普通人的生活。”

“这一次，他们抓了一群最爱北京的年轻人。”这位朋友说。

毕业后，男朋友想去美国继续读书，曹芷馨却想先去工作。她一直想进入出版业，还没毕业就开始就在几个著名的出版社实习，包括广西师大出版社、上海书店、

个著名的出版社实习，包括上海四联出版社、中华书局等。

在男友看来，她想去出版业，还是和她喜爱读书和写作有关。另外，学历史专业，本来就业就困难，周边的同学，或者考公务员，或者去国企、大厂什么的做宣传员，或者去中学当老师。这似乎都不是她的兴趣。

可他们也都清楚，在当下的中国，出版业其实“很窒息”，许多出版社都面临着财务危机，要在北京立足，对年轻人来说并不容易。

最终，作为一名优秀的实习生，她留在了北京大学出版社，并且转正成为一名正式职员。她工作也十分卖力。如今，在B站上，还有她介绍《全球通史》这本书的一个长视频。那时，她刚到北大出版社，正赶上推广这本书。

“她很聪明，老师也很欣赏她。她有学术能力，也有思考的敏锐度。我一直希望她也能出来继续读书。”男友说。事实上，她身边的朋友，很多都有留学的经历，她也想出来看看。

她的老家在湖南衡阳，父母都在体制内工作，家里人大多是公务员。但最终，伴随着读书、成长、阅历，这个女孩，渐渐长成家人并不了解的人。

2018年，她和男友相识，2019年开始交往。他们在一个电影放映活动上相识，两人都在读历史学的硕士研究生。2021年毕业后，他出国了，两人开始异国恋，每天都要电话。有时，两人视频，什么也不说，各自做各自的事，她会弹奏尤克里里，唱着歌。爱情甜蜜，他想，只要再重逢，就要考虑结婚的大事。





2022年11月27日，上海的示威現場，一名示威者被警察逮捕並被押上警車。攝：AP/達志影像

3 “半积极分子”，“有趣的人”

在最熟悉和亲近的朋友眼中，曹芷馨只是一个有趣的、爱做些好玩事情的年轻人。她并不是政治上的活跃分子。“她太年轻了。从学校刚毕业，一切都开始，还没来得及做点什么。”

和那个晚上很多去亮马桥现场的人一样，她并没有行动的经验。“在前一天上海的抗议事件发生后，当天的北京，有一种很乐天的气氛。去现场的很多人，甚至都没有戴口罩。”一位朋友回忆。

在男友眼里，她和她的朋友们，此前并没有参与过政治活动，也没有真正反对过什么。他们中的很多人，甚至没有公开地发声过，也没有留下公共言论。

“可她又是一个多么有趣的人啊。”男友说。她和朋友还曾一起出去“卖唱”。她不是专业的歌手，就是觉得好玩，像玩闹一样。大家都很开心，也并不是很认真。“挺逗的一群朋友。”

他认为，曹芷馨和她这次被抓的一些朋友，最多算是“半积极分子”。她们一起做一些事，但都很正常，包括放电影、读书会讨论等等，这些放映和讨论关注女性、环境、家庭等议题，但并不是那些在这个国家绝对被禁止讨论的东西。

而她大部分的朋友，是这一年多才形成的圈子。毕竟大家都是刚毕业才两年多。

她有一位叫曹原的朋友，也是人大的同学，学社会学。那时候，大家一起去电影节看放映。“在路上见到好几次，后来回到人大，在食堂门口又碰上了，这就熟悉了起来。”

曹原参与一个人类学的公众号编辑。和大家一样，关注相似的议题，从文学、艺术、电影到女性主义，生态自然等，也包括政治自由。2023年1月6日，警察带走了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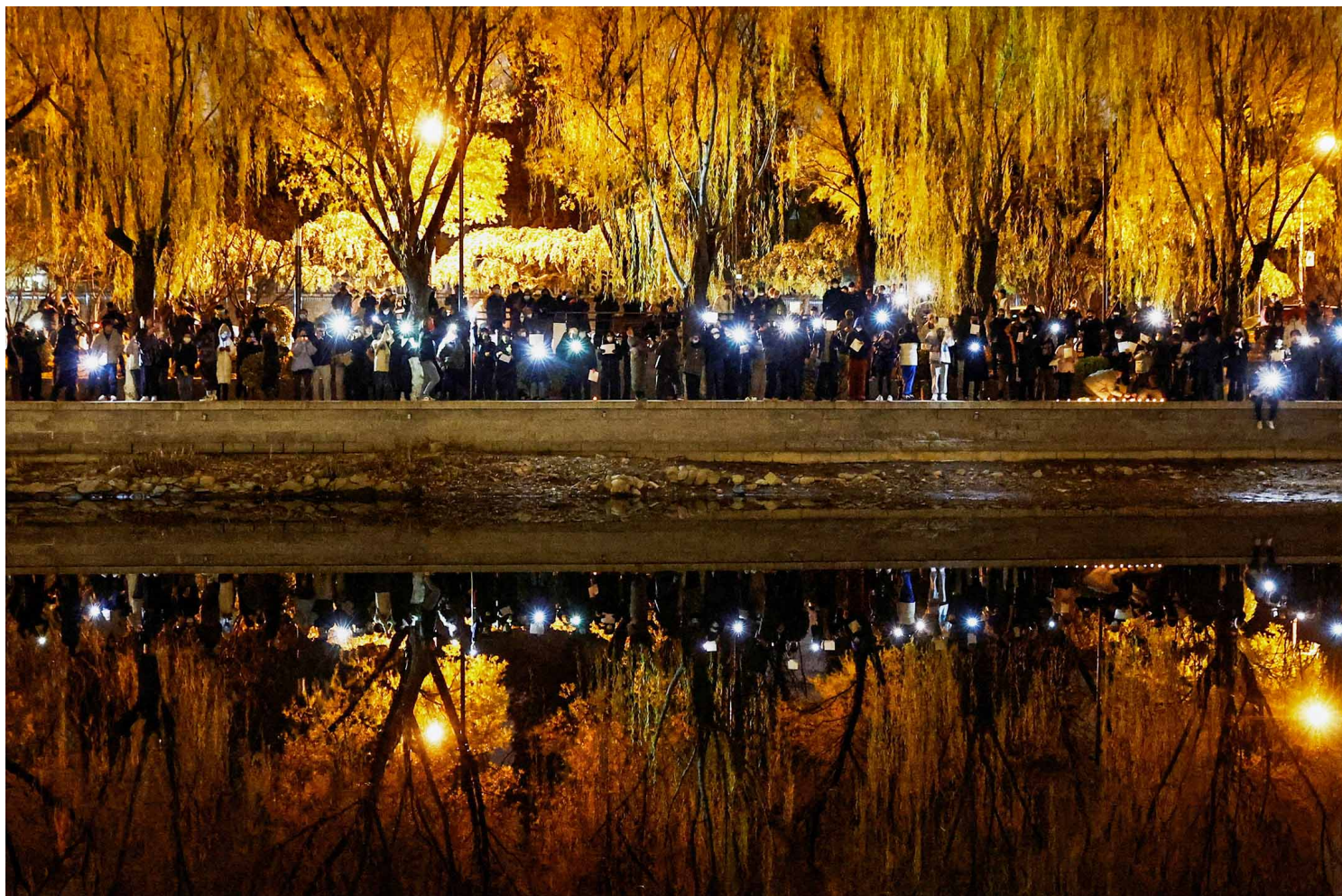
和曹芷馨一样，她的这些朋友也基本都住在胡同或周围。“对很多精致的年轻人来说，住进胡同里，没有厕所，而且周围住的都是快递小哥、送外卖的人。一般人接受不了。但大家都愿意接地气。”蓬蓬说。

蓬蓬也是朋友圈中重要的一个。11月27日的亮马桥之夜，她没在北京，所以目前平安。她说：“基本上我的朋友们都有这个气质。她们愿意去做一些生活中的微小抵抗。”这些抵抗，很多时候，基于对性别身份的认知，以及对各种肉眼可见的不公正而发生。

这次成为焦点的亮马桥，原本就是一个年轻人喜欢去的地方。那里原来河水污染严重，但在2019年完成了改造，成为一个很宜人的城市公园。而且这一带也是使馆区，文化多元，有世界各地的食物，中东菜、北非菜、印度菜等，吸引着有好奇心的年轻人。

但是，城市在外观上的发展和变化，不能掩藏这几年越来越压抑的政治氛围。近年来，中国对言论环境的严苛打压已毫不掩饰。不管是媒体上，还是学校里，各种议题渐渐都成禁忌。三年疫情的封控，环境愈发压抑。一位朋友说，每次聚会、放映等活动完，大家一起会讨论，但其实大家也都“挺迷茫的”。“讨论完了，也不知道怎么办。”

有时候，这些年轻人也会组织徒步，一起去郊野走走。曹芷馨喜欢小动物，也关心环境。此前她和男友一起去过南京的红山动物园。在这次失去自由前不久，她还在红山动物园认养了一只小野猪。每年捐几百元，“给小野猪加餐”。



2022年11月27日，北京，人們聚集在一起守夜並舉著白紙抗議政府防疫政策，同時紀念烏魯木齊火災中的遇難者。攝：Thomas

4 酒馆、地下音乐，那些夹缝中不可言说的公共空间

2018年5月，正值1968年发生在法国的“五月风暴”青年反叛运动50周年。

5月11日，位于北京五道口附近的706青年空间，举办了一场“致敬60年代”的朗读会，这栋居民楼的二十层，被改造为图书室的拥挤逼仄的小房间内，挤满了人。这是为纪念“五月风暴”而举办的其中一场活动。

人们朗诵着文章与诗歌。空间里的一款黑色T恤上写着白色的字：“我们游荡在夜的黑暗中，直到烈焰将我们吞噬”。这是居伊·德波执导的纪录片的名字。

在“五月风暴”的纪念活动上，蓬蓬第一次见到秦梓奕（2023年1月19日被取保候审）。她们很快成为好朋友。后来蓬蓬到国外做交换生，她们还曾一起去漫游欧洲。

706是由几位年轻人于2012年发起的乌托邦式的自治空间，因各种困难，如今在北京其实已难以为继。大家在这里读书、讨论、生活，是许多朋友相遇并互相影响的地方。翟登蕊和李思琪也是在这里彼此认识，并成为朋友的。

本世纪初，2000年前后，互联网在中国正蓬勃发展，经历过1990年代的市场经济发展，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，以及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，在北京，线上线下的公共空间，可以进行公共讨论的地方不断冒出来。三味书屋、万圣书园等都处于鼎盛时期。曾经的北京，有热气腾腾的公共生活。

2015年，当蓬蓬到北京上大学时，“新时代”已开启，很多过去老的公共空间遭到打压，渐渐萧条。706青年空间在夹缝中依然存在和生长着。在蓬蓬和朋友们常去的那个时期，“空间里的年轻人，对各种各样的不平等，不公正议题，都非常敏感。”

蓬蓬常去学校附近的单向街书店，以及规模已缩小很多的万圣书园。除此之外，年轻人们更多去的是一些小酒馆，有地下音乐的酒吧、livehouse等。曹芷馨就是这样。她喜欢传统的民谣，包括新裤子乐队、张悬的歌等。“她也喜欢地下音乐，但还不是最激烈的那种。”她的男友回忆。

蓬蓬也喜欢地下音乐。回顾过往与朋友们相识的日子，她总是想起北师大附近那个叫“暂停”的小酒馆，虽然它如今已不复存在。那里只有10平米不到，挤在胡同里，透过一张开在墙上的玻璃窗，能看到里面。

曾经，蓬蓬和她的朋友，也是这里的常客。她记得那些夜晚，很冷。小酒馆实在太小，大家只能站在门

口。寒冷的冬天，大家站在寒风中聊天，酒馆会为大家提供军大衣。

酒馆内常有“不插电”的演出。一个叫万花筒的音乐小组，曾在停电的晚上在这里即兴弹唱。在另一个视频中，这个音乐小组的人在胡同里的屋顶演出。冬日的下午阳光明亮而刺眼，风呼呼吹着，天很蓝，他们弹唱到夜幕降临，因寒冷而披上了被子。

曾几何时，北京这些边缘地带的酒馆，不仅承载了年轻人的文艺气息，更重要的，是为这些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公共空间。他们在这里寻找气息相投的同伴。在监控越来越严密的国度，寻找自由。

这些自称“廉价而业余”的小酒馆，却吸引了很多乐手和艺术家光顾，年轻人也循声而来。“开酒馆本身不是我们最想做的。就像节目里我说的，人都是要有一个寻找自我的过程。”在一些节目和文章中，酒馆的老板曾这样讲述。“我们酒馆好像有一种乌托邦气质，吸引来的都是好同志”。

“我一直在想我在北京胡同开一家小酒馆能有什么意义，其实趁年轻，开一间酒吧，帮任何人完成一次个人理想主义式的实验，这是目前这个社会所不能给的。”这或许可以看作是这些小酒馆的精神底色。

在蓬蓬眼中，在北京，这样有个性的小酒馆不止一家。另一个酒馆，在2019年开张2个月，卖光了2019杯酒，然后就决绝关张。

除了这些小酒馆，在曹芷馨、蓬蓬以及她们的朋友们喜欢的鼓楼一带，原本就有很多音乐空间聚集。西至地安门外大街，往东南到东四，往北不超过雍和宫，不足5平方公里的地方，由几条大街和无数条小胡同组成的二环内核心区域，是北京小型演出现场的集中之地。

这一片，以音乐为载体，逐渐形成一个小圈子。年轻人喜欢聚集在这里听乐队唱歌。中央戏剧学院也在附近，影视公司，文化传媒出版机构多。很多时候，朋友们一起去看演出，“江湖”、“愚公移山”等都是她们常去的地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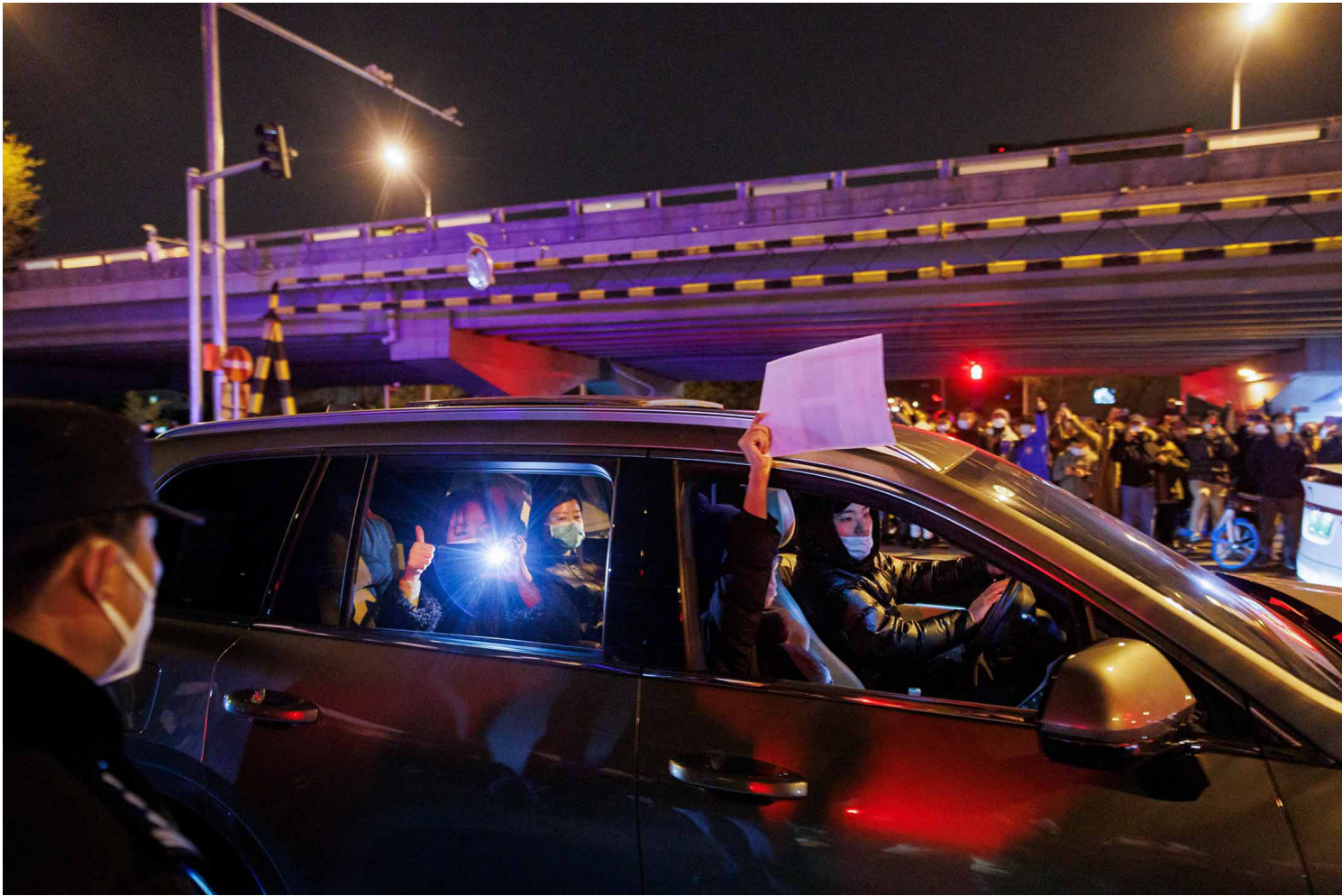
“至少在2005年到2015年的这十年间，这个片区是北京独立音乐和现场演出的心脏，吸引着全北京最负盛名的独立音乐人，以及最爱时髦和新鲜声音的年轻人。”有文章曾这样描写。

2022年12月18日，因为去过亮马桥悼念现场，记者杨柳和她的男朋友林昀被抓。早在上大学时，林昀就和朋友开了一家小酒馆，叫“不二酒馆”。林昀也是一位有才华的音乐人。

蓬蓬曾在不二酒馆兼职过，酒馆的风格很文艺，有点像八九十年代的香港风。很多酒都是以歌名或地名命名。不同于那些商业化的酒吧，这里会做一些读诗、观影的活动，也有露台上的演出。她记得，此前酒馆曾放映过一部女性主义主题的电影《正发生》，还被警察关注。

蓬蓬是先认识杨柳的。杨柳做记者，文字很好，蓬蓬先是成为她公众号的粉丝，彼此加了好友，常在朋友圈互动，后来到北京后又见面，便成了朋友。

如今回顾，蓬蓬觉得自己最喜欢北京的理由，正是因为这些不同的群落。2017年，北京打压“低端”人口，清理掉很多胡同里的有趣空间。加上这三年严酷的封控，走了很多人，很多公共空间在慢慢消亡。但蓬蓬觉得，北京还是有那种很丰富肌理的场景。更重要的，是有一个朋友之间的社群。“我们之间的命运是连结在一起的。”2023年1月，蓬蓬说。



2022年11月28日，北京，為烏魯木齊火災受害者守夜後的集會上，一名車內的人拿著一張白紙抗議。攝：Thomas Peter/Reuters/達志影像

5 “一群认同行动主义的人”

在得知翟登蕊（大家都喊她登登）被抓之后，阿田去搜索，才发现自己和登登在好几个共同的群里，大多是关注疫情的。

阿田如今任读入关子的博士。今年9月才离开北京。此次大去日田升已微抵捕的冒止馨、崔登蕊都是他的朋友。“如果我没有离开北京，11月27日那个晚上，我一定会和她们在一起。”他说。和蓬蓬一样，他觉得自己的命运和她们是连接在一起的。

“这次被抓的朋友，她们有很多女性主义的意识，但其实她们关注的议题是不受限的。她们都是同情心、能动性很强的年轻人。面对不公平不公正的事，都是先参与再说。”阿田说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他认为大家首先是一群行动主义者。

阿田回忆起最后一次和登登聊天。因为当天刚好参与了一个网络上的交流，议题是关于“躺平”的。阿田问登登：“是不是现在打算躺平？”她说目前还没有办法躺平。“我想，大部分的原因，还是经济的因素。”

登登是白银人。家境不错。她先是在福建师范大学上了本科，又考到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读研究生。在被抓之前，她的身份是“网课教师”。她的朋友、此次也被批捕的李思琪，曾经写过登登打工的经历。

研究生毕业后，登登先试在教培行业，后来因为“双减”，又去做直播卖教辅书。蓬蓬说，自己和几个朋友都很惊讶，登登那么爱读书的一个人，怎么会去做直播？但登登自己做得不亦乐乎。

蓬蓬事后回忆，登登说过，其实这也是一个田野调查的机会，可以了解到很多家长到底怎么想的。登登兴趣十分广泛，她对戏剧非常感兴趣，所以决定申请奥斯陆大学的戏剧专业，去继续学习。

在阿田的眼中，自己的这些朋友，家境都不太差。家里也都和体制、半体制有关。在她们这次出事后，联络家长很困难，父母们的态度多都是“要相信政府”。也能看出，“他们和家人的沟通是不足的。”

阿田记得，2022年春节过后，他联络几位学社会科学的朋友，想去考察南方的一些有色金属的矿。四五个人一起去。他们选择了去湖南郴州的几个矿，曹芷馨也在其中，湖南是她的家乡。

“她性格非常外向，而且她比较沉着。虽然毕业没多久，但已可以很有底气地和受访者交流。”阿田回忆说。虽然此前大家并不熟，但可以聊到一块儿去。“我们都对不发达的地方有一些感情。”

在阿田看来，曹芷馨研究环境史，“她是真的关心环境”。他们曾一起聊过华南的这些有色金属矿和北方的煤矿有什么不一样。谈到北方的煤矿至少能给本地的农民带来利益，而南方这些有色金属矿都是国有矿，本地人并没有因此受益。

他们想研究那些不发达的地方，没有那么“南”的南方，结合历史、地理、环境的因素。而在这种探访性的田野调查中，阿田发现，曹芷馨可以很自然、“有谱”地去和人聊。“她完全是出于朴素的好奇，以及对社会

的关心来做这一切。”

他们一起去了铀矿那边，找到一个寡妇村，这个村庄里，第一代“找矿队”的矿工全都得矽肺病死了，他们在得病之后，沦为最底层的城市平民。对这种发生在自己家乡的事情，“一般人如果不愿意多管闲事，都不会去。但她就去了。”阿田说。

2020年，一直在上学的阿田“想和社会接触”，曾去一家新闻机构做了半年记者，还是秦梓奕牵线。

在阿田看来，中国有太多的问题，而自己的这些朋友，包括曹芷馨、秦梓奕、翟登蕊她们，都对这些问题有关怀。其中一些朋友，想结合短线的新闻来关注，通过去做报道。“她们都有有机的问题意识。”在他眼里，这些朋友是这么年轻，又如此热情，是认同“行动主义”的朋友。她们关心眼前具体的不公，也是更加自我赋能的。

“基本上来说，她们都是一路升学上来的好学生，和社会原本隔着一层的。”阿田说。他依照自己的经验，认为，对这些“好学生”，也会有一些让你和社会隔着一层的工具，例如做学术。但是，总有一种力量，可能对这些一直升学上来的生命状态产生冲击。例如一些公共空间，例如一些社会探访，以及参与一些志愿行为。阿田认识的一位朋友，就曾在上海疫情中，去养老院采访，做出第一手的稿子。

“当你一旦开始关注社会，会很快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。通过文章等，发生一些链接。”事实上，在北京，有更多这样的聚会，总是有一些共同的议题会引起她们的关注。这些议题就是比较广泛的“社会不公”。

阿田认为，对ta们这一代人来说，“八九”运动已经遥远，还不是最有肉身经验的不公。对今天的这群人来说，当ta们站出来，并不是意识形态先行，还是出于很朴素的正义感，大家也愿意去克服恐惧。“Ta们有能力去克服社会性的冷漠，而且不轻易屈服。但同时，大家也非常缺乏经验。”

“对她们来说，生活是非常重要的，除了个别人参加社会事务比较多，更多的人是一种亚文化的气质。”阿田说。但他也认为，“这一切并不矛盾。大量的年轻人，并不是高强度关注社会事件。具体做一些事情，也和机缘有关。”

“今天在中国，你无论做一些什么，都会受到打压。但是，只要有不公不义在，反抗总会发生。”阿田说。





2022年11月27日，北京，為悼念烏魯木齊大火死難者，市民在追悼期間點燃蠟燭。攝：Kevin Frayer/Getty Images

6 “这些封控的日子，和战争没有什么不同”

2022年初，蓬蓬离开了学习、生活6年的北京，去了广州。9月，她重返北京，去寻找分别了一段时间的朋友们。那段时间，她暂住在胡同里的朋友家中。

朋友们见面相聚很开心，但也都说到十分压抑。从2020年开始的清零政策，到2022年开始更为严厉。年初，先是西安封城一个月，接着是上海长达两个多月的封城。整个中国，封城已成为常规手段，全员核酸，以及动不动的全城“静态管理”。她们身处其中，每日都感受着荒谬。

“元婧告诉我，曾经有一次，她在寒风中排队四个小时才等到做核酸，还飘着大雪。”蓬蓬说。她回忆说，这次大家聚会，也聊到“润”的话题，因为实在是太压抑了。

2022年5月11日，其中一位朋友的微博发了这么一条：“南磨房乡南新园小区，要求全小区所有住户去隔离酒店集中隔离，一人不留。未告知要集中隔离多长时间，未告知是否入户消杀。自5月8日以来，所有住户严格按照防疫封控要求，足不出户已久，每天配合上门核酸，突然拉走集中隔离恐会暴露在风险环境中。许多住户偏瘫、许多住户怀孕大月份、许多住户家有新生儿……现居民怨声载道，请有关部门重新考虑全小区集中隔离政策。”

这条微博，直观地描述了处于封控中人们的生活常态。而蓬蓬后来才知道，此前，杨柳因为在微博上批评防疫政策，已经被网警找房东威胁。

酒馆最早开在鼓楼的前圆恩寺胡同，由于北京治理“开墙打洞”的政策搬到了三里屯。据说，搬走的时候，为了把一块小黑板搬走，把原来的楼梯都拆了。

小黑板上写着一首诗：

即使明天早上 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 让我交出自由、青春和笔 我也决不会交出这个夜晚

这是北岛的《雨夜》，2014 年酒馆开业当天写上去的。